

《人民日报》的前身最早是1937年12月11日创刊的《抗敌报》(晋察冀边区总军区军政委员会机关报);1940年11月7日更名《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1946年5月15日创刊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1948年6月15日创刊的华北《人民日报》(华北中央局机关报);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随党中央领导机关进入北平后,还出版过《人民日报》(北平版)、《北平解放报》、《人民晚报》、《人民日报》(北平新闻)等副报。

在《人民日报》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用过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三种报头。



第一次《人民日报》创刊号,一版全套红,1946年5月15日,刘伯承题词。



《人民日报》,1946年8月1日,第75号,所刊报头是毛泽东第一次为《人民日报》题写。



《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日的报纸。

毛泽东三次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

集字「人民日报」

1946年4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准备办一张机关报,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和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会议长的薄一波赴延安汇报工作,他受报社委托,请毛泽东题写报头:拟写报名是《晋冀鲁豫日报》或《太行日报》。毛泽东欣然应允,但指出:“为什么你们不叫人民日报?这个名字有没有人用过?”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于1946年5月15日创刊,题字还没有到,于是编辑部就自己动手应急,从各种毛泽东手书中集字而成“人民日报”4字。当时已是晋冀鲁豫《人民日报》重要干部的李庄,走遍邯郸,也找不到会制作铅版的制版师傅,只好请人木刻制版,将毛泽东的集字做成由右向左的横幅报头,用在创刊号和随后的报纸上。

1946年5月1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创刊号第一版为全套红,左右报眼为:鸣谢启事和广告刊例。头版头条是《国民党当局破坏菏泽协议,蓄意放水淹我解放区,不顾七百万人民生命,图逞内战阴谋》;左部一长条是《发刊词》,《发刊词》标题上方还有装饰的木刻图案,是解放军战士策马飞奔形象。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为《人民日报》出版题词:“力争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独裁分裂乃人民呼声。”第一版上还有:《国民党军结合敌伪,高唱备战,大举调动,屡犯我边区,三个月大小进攻九百余次》《沁县阎军特务横行,殴打我联络组人员》《我已向东沁线小组提出抗议》《周徐白三氏飞南京》《蒋介石飞新乡》《何思源密谋进攻解放区,密运物资予聊城伪军,大批反共文件一并为我查获》等消息。

第一次题写报头

一个半月后,毛泽东于6月间在延安题写了由左向右的横幅《人民日报》报头。当时,毛泽东一连写了五幅“人民日报”,写完后对身边的警卫员们说:“谁写得好,也来写一张。”大家都说不会写。于是,毛泽东便请战士们说:“哪张写得好,帮我挑一挑。”毛泽东第一次题写的人民日报报头字,由薄一波带到河北武安,编辑部美工再将这个亲笔题词木刻成新的报头,刊用在7月1日以后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上。

1946年8月1日星期四出版的第75号《人民日报》是毛泽东第一次为《人民日报》题写的报

第二次题写报头

创办华北《人民日报》时,毛泽东于1948年5月27日从阜平县花山村来到平山西柏坡,为新创办的《人民日报》题写报头。毛泽东提笔挥毫,边写边说:“人民日报这四个字啊,中间两个字要小一点,两边两个字要大一点,这样就好看了!”毛泽东一连写了4行“人民日报”共16字,交给薄一波转人民日报编辑部。题写的时间应在6月10日左右,最迟不会晚于6月12日。

1948年6月15日,华北《人民日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里庄创刊。时由《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华北中央局机关报,同时担负党中央机关报职能。

报纸定价是每月日报3万元,冀钞3000元。创刊号所列通讯处为邯郸、石家庄、邢台邮局转。

报头两边报眼位置,刊登了重要启事,全文是:一、中共华北

头。该期报纸为对开二版,报眉上有汉语拼音“人民日报”字样。从报头下方可知报社相关信息:一是本报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创刊;二是通信处为武安邮局转;三是价目,零售每份五元,预订每月90元,邮费本市不收,外埠每月2元;四是本报已呈请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备案,发给边民新字第一号新闻登记证;晋冀鲁豫边区邮政管理局登记认为新闻纸类发给登记证第六号。其中有关报社编辑部地址,当时战争状态,报社亦有军事保密性质,实际上编辑部是与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指挥部相邻。

中央局决定,晋察冀区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区人民日报实行合并,统一出版本报。本报受命于今日创刊。晋察冀日报及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即日停刊。同时,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与晋冀鲁豫总分社也奉命合并为华北总分社,原晋察冀总分社与原晋冀鲁豫总分社所辖各分社今后统由华北总分社领导。二、原晋察冀日报及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订户均为本报订户,六、七月份仍按原订价寄发,不另加价。从八月份起,改按新价订定(应在7月25日以前预订)。原晋察冀日报及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通讯员均为本报通讯员,希能继续源源供给稿件。三、本报创刊伊始,人力物力均未布置就绪,编辑发行诸多困难。发行脱漏现象恐在所难免(本报当尽量设法补发)。敬希党政军民各业各界多方指导帮助,以匡不逮,无任企感。

第三次题写报头

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日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并沿用1948年6月15日的期号。为此,毛泽东第三次挥笔题写《人民日报》报头,此报头一直沿用至今。

1949年10月1日第四六八号《人民日报》是开国大典之日的报纸,这天是星期六,农历己丑年八月初十。

报头两边的报眼位置,分别是两个口号: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一版头条是: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56人亦已选出。毛主席戴八角帽的大幅头像刊登在醒目位置,接下来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位副主席的照片。

二条新闻是《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条预告性新闻《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今日在首都隆重举行》。第四条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手续极郑重,五百七十六人无一弃权》。第五条为《新疆人民获得和平解放,人民政府新疆代表函谢毛主席朱总司令》。

报头下方刊登了版权信息:中央《人民日报》系为华北邮电总局登记认为新闻纸类,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登记新字第三号。今日两大张。

该报定价每份100元,每月3000元,外埠每份外加邮费10元,全月300元,当时的电报挂号和电话号码都是4位数,列有编辑部、发行部、广告部电话及报社和营业部电挂。营业部地址在宣内大街154号,即现在的新华社地址;报社社址在北京王府井大街117号,即王府井路口往北数百米路西。记得早年笔者每次去百货大楼、新华书店买东西,都会路过挂有大牌子的人民日报社,后来人民日报社搬到新址金台路后,这里一度成为经济日报社所在地,经济日报印刷厂也在这个大院里面。(据《人民政协报》)

拾遗

王国维抄书

王国维先生是近代难得一见的勤奋刻苦的读书人,他曾经说过:“余毕生惟与书册为伴,故最爱而难舍去者,亦惟此耳!”王国维先生一生勤于读书,写书,其实,抄书也是王国维读书做研究的一条重要方法。

王国维请人抄书,自己也亲自抄书。他曾经在给马衡的信中就提到:“敦煌出唐写本《切韵》原影本一时未能印行,弟故竭二十日之力照其行款写一副本”。为了留下重要的历史书籍资料,他整整二十天不舍昼夜将此书抄录完成。王国维为近代学者,他抄书的主要目的,虽然有通过抄书加强记忆的效果,但更为重要的是设法保留稀有珍贵之书,以便今后查阅或者刊印;其次是为音韵学的研究搜集不可缺少的资料,为音韵学的历史研究寻求证据和方法。因此,王国维在研读音韵学书籍时,抄书非常勤奋。1917年7月26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说:“今日已将《和名类聚抄》中所引唐人韵书钞出,中有陆词《切韵》五十余条,郭知堂《切韵》五条,薛晦《切韵》二条,王仁煦曰一条,祝尚邱《切韵》三条,裴务齐《切韵》三条,孙緌《切韵》二十一条,《唐韵》三百七十一条。此皆《唐韵》所本。而所引《唐韵》尤与《广韵》相合,如《广韵》实合诸切韵而成。”王国维先生抄书,也并非简单劳作,他已在抄录书籍的过程中博闻强记,吃透了书本精神,书籍抄录完毕,也将书籍精读研究了一遍。

王国维通过抄书,一方面保存和抢救了一批珍贵古籍,另一方面加深了对书籍的认识和理解。学人已知,但是王国维先生孜孜不倦的为学精神和坚韧毅力,却像明灯一样,照亮后世学人的读书治学之路。(据《海南日报》)

胡适换专业

1910年,胡适考取了庚款奖学金,作为第二批中国保送留学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农科。一次,胡适在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上实验课,面对眼前30多个苹果一筹莫展。美国学生对各种苹果异常熟悉,谈笑间就把苹果分类做完,随即挑选几个中意的苹果塞进口袋,扬长而去。他与其他几名中国同学只得在实验室埋头苦干,终于一一分出类别。可就算这般加倍努力,考试成绩还是差强人意。

在这些实验之后,胡适开始反躬自省:自己这样学农,是否已铸成大错呢?他对这些课程基本上没有兴趣,而他早年所学,也派不上丝毫用场,与他自信有天分有兴趣的各方面,都背道而驰。虽说胡适记忆力非常好,考试前临时抱佛脚也能应付考试,可几天之后,就会把那400多种苹果的分类忘得一干二净。胡适意识到,勉强去学习,对自己来说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两条路摆在胡适面前:一是迎难而上,认真钻研农学,提高成绩,拿到毕业证;二是认真反省,审视学农对自我成长之价值及意义所在。选择是困难的,胡适在两条路之间徘徊良久,最终选择了第二条路。在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学习了三个学期后,胡适终于下决心改变所学专业,转入到该校文理学院。从此,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学成归国后,胡适全身心投入到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中,为白话文摇旗呐喊。为此,他常告诫青年学子,劝他们认真对待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眼前的社会之需为标准。学子们以自己的兴趣和禀赋作为选科的标准,才是正确的。(据《人民政协报》)

张学良:最怕跟父亲吃饭

张学良回忆起跟父亲吃饭的场景时,苦笑着说:“我当时恨不得逃到天边去。”“但凡我父亲在场,我们都不敢吃好的,叫他看见了就打。我最怕跟父亲吃饭,他自己喜欢吃的菜,就会给别人夹,特别喜欢夹给我。但是他吃的那玩意儿,我是真不敢吃。蚕蛹,他最爱吃,给我简直没法吃!还有臭鸭蛋,也必定会夹给我吃。而且跟他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不敢掉饭粒,掉桌子上还好,掉地上也得捡起来吃掉,这是最怕的。”(据《天津日报》)

红色百年

我是一台苏制留声机。我曾经的主人,是任弼时。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我已经80多岁。“退休后,我被‘家人’送到主人任弼时家乡,如今静静地‘躺’在纪念馆里,低吟浅唱,回放主人崇高的精神追求。

一台留声机的自述

20世纪30年代,我“出生”于苏联。我与中国结缘,要追溯到1937年。那年7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随后开展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我听主人讲,1938年2月,中共中央委派他前往共产国际。他到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一份长达一万五千字的书面报告大纲。随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他又对书面报告大纲作了详细的补充说明,让共产国际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中国抗战形势有了全面了解。

共产国际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承认“毛泽东是从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

我的主人在莫斯科的工作卓有成效,受到共产国际和兄弟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高度赞赏,共产国际总部机关决定将我赠送给他。

不久后,我跟随主人跨越万水千山,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主人居住的窑洞里,我经常给他和战友们“唱出”优美的苏联乐曲。那段异常艰苦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至今记忆犹新。

解放战争打响后,我跟随主人走出延安,转战西柏坡,最终来到北京。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我倍感自豪。

主人因积劳成疾,没有能参加开国大典。为了弥补遗憾,有“文艺范儿”的他邀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围坐一起,奏响小提琴纪念战友真情,献给摇篮里的新中国。

一年后,主人不幸因病逝世。病逝前一星期,他还和基层干部在办公室座谈,调查农村党员的思想情况。主人英年早逝后,我转由他的二女儿任远征保管使用。2002年,位于主人家乡湖南汨罗市的任弼时纪念馆建成开放之际,任远征姐姐将我捐赠给纪念馆。

2006年,我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据新华社)

谁最先仿行中国科举考试制度？



(资料图片)

唯其如此,唐代后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止,科举考试没有中止。五代军阀争斗不息,政权更迭如走马灯,科举考试没有间断。两宋三百年间,宋辽、宋金、宋蒙战争,未曾打断三年一舉的科举考试,南宋高宗在自家性命难保的险境下,宁可下放到地方进行类省试,也未曾中断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宋度宗咸淳十年,南宋临近灭亡,还进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辽、金、西夏、元朝,少数民族所建政权,无不实行过科举制度。清末,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出逃,次年仍下令补考乡试和会试。科举与国运相联,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权力的象征之一,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重要标志,是调节国家政策的杠杆,是士大夫梦想所寄,是凝聚民心的纽带。科举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军事、教育、文化、

经济、风俗、人心之影响,无与伦比,至今在海外犹不絕余响。

中国科举不仅在中国。中国科举又是世界文明的一个辐射源。朝鲜是海外实行科举制时间最长的国家。从公元958年起至1894年止,实行了936年。其制既学习唐宋,又有自己的创造。奉使到过高丽国的宋使者徐兢在其名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说:“若夫其国取士之制,虽规范本朝,而承闻循旧,不能无小异。”科举制在朝鲜影响之大,仿佛中国,至视为“我国公道,唯在科举”。越南推行科举制长达844年(1075-1919)之久,仅次于朝鲜,然其废罢科举时间比中国还要晚14年。科举取士,在越南具有权威性和实用性,“科举抡才,实为盛典”。科举制在东亚的传播,为构建东亚儒学文化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功至伟。

中国科举考试的先进文化,为西方欧美国家所学习、所效仿。西方人把中国科举考试,与中国四大发明相比。英国人罗伯特·英格尔斯评论英国东印度公司采用了中国科举考试的竞争原则时说:“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一次伟大变革。”事实正是如此:英格尔斯当时的预言并没有错,东印度公司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为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开辟了道路,考试选才机制像一桶火药轰开了政党分肥制的大门,科举制最终通过英国对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代美国学者顾立雅明确肯定了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在建立现代世界文官制度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因此,刘海峰教授顺理成章地提出: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成为一个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科举选拔人才,通过科目考试实现。唐代科目众多,备选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孝廉、明法、明算、三史、开元礼等。宋代是科举制完善期,也是高峰期,两宋共举行118榜,录取登科人11万之众,是历朝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朝。其后,元、明、清三朝,进士科成为科举考试唯一科目(临时开科除外)。明代最初一级考试称乡试,所谓“三年一大比”。乡试之年为“大比之年”。

明代天一阁收藏的明代《乡试录》,已由宁波出版社于2016整理出版了277种。而分散在各地的清代乡试录,尚未见有汇编出版。在科举学界热切的期盼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首次搜集了清代375种《乡试录》,经整理,于最近分辑陆续影印出版,冠名曰《清代乡试文献集成》。规模宏大,名副其实的“集大成”。如此集中地推出清代《乡试录》,海内外也是首次,具有重大科举史料和清代历史文化价值,是科举文献出版的一件盛事。

(据《北京日报》)